

元代儒学的传播方式

娜日娅

(内蒙古师范大学 青年政治学院双语系,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有元一代, 儒学在国家“教化”政策推动下, 渗透到了社会各个群体。从而其传播也成为完善元代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元代儒学主要是通过书籍、科举、学校等三个渠道来传播的, 具体体现在经籍的翻译、科举的程序和内容, 以及教科书的选择与阐释上。

关键词: 元代; 儒学; 传播

中图分类号: I207.9 **文献标识码:** A

从1206年成吉思汗创立蒙古帝国、1227年灭西夏、窝阔台1234年灭金到忽必烈1279年灭南宋, 中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统一。元朝的统一使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冲突、融汇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宗教之再澄清、民族之再融合、文化之再普及促进和深化了元朝的汉化进程。随着儒学在政治文化领域主导地位的确立, 其传播也得到了有一定的普及与发展。那么, 儒学的基本概念是什么? 追根溯源, 儒学是春秋末期由孔子确立的, 以伦理道德思想为核心, 以“仁”、“礼”、“命”三个基本范畴构成的观念体系。儒学的基本思想特质和理论结构在先秦就已形成, 汉代以后的儒学, 基本上沿着对儒家经典的训解和对儒家思想的阐释等两个学术内容发展而来, 前者是儒学的学术基础—经学, 后者是儒学的理论形态—儒家哲学。正所谓文学和哲学是近邻, 经学和儒家哲学是相辅相成的。儒学正是在二者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相互推进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 儒学虽涉及法律、宗教等领域, 但伦理道德一直是其主要功能。有元一代, 儒学在国家“教化”政策推动下, 通过国家颁布之经义、民间载道之译文、启蒙之读物的多种渠道, 渗透到了社会各个群体。从而其传播也贯穿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 成为完善元代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元代儒学主要是通过书籍、科举、学校等三个渠道来传播的, 具体体现在经籍的翻译、科举的程序和内容, 以及教科书的选择与阐释上。

一、翻译传播

儒家经典, 世称“十三经”。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就儒家经典被确立之过程, 明顾炎武曾简要概括说:“自汉以来儒者相传, 但言五经, 而唐时立之学官, 则云九经者, 《三礼》、《三传》分而习之, 故云九也, 宋时程朱大儒出, 始取《礼记》中之《大学》、《中庸》, 及进《孟子》以配《论语》, 谓之四书。本朝因之, 而十三经之名始立。”^[1]自古以来, 儒家经典作为儒家政治活动和教育活动的依据和内容, 逐渐成为了儒家的学术标志。而且儒经作为儒学学术基础的载体, 也成为元代儒学传播的主要载体。

元代儒经之蒙译原因有二: 第一、维护统治的需要。文化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如要统治具有悠久历史和高度文明的农耕民族, 必须讲究一套统治之术, 而中原王朝在此方面有较丰富的经验, 儒家经典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圭臬, 颇具教科书的功用。另外, 儒家经籍所体现的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秩序和蒙古族传统思想在某些方面不谋而合, 而且这种伦理秩序是农业社会生活秩序的基础, 因此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秩序来维系元朝的社会生活秩序也算是达到“以汉治汉”的目的了。第二、文学交流需要。元朝的统一为蒙汉两种文化提供了广泛交流的机会, 而文学文献交流是元代蒙汉文化交流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儒家经籍作为汉文化的典范, 当然是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民族若想了解另一个民族的文学, 必然会首先关注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于是儒家经籍就成为蒙古族了解和学习汉文化的首选典籍。可见元代蒙古族接受

和翻译儒经是有明显的目的性的。

元代不仅有特定的翻译机构和出版机构，还有数量较多的翻译人员。元朝为皇室服务的翻译机构为艺文监，内八府宰相及蒙古翰林院。而专门负责儒书之蒙文翻译及儒书之校勘的为译文监。译文监始置于天历二年，秩从三品，后改为崇文监，由翰林国史院统领。分别置太监二员、少监二员、监丞二员、典簿一员、照磨一员、令史四人、译史一人、怯里马赤一人、奏差二人、典史三人、监书博士二员、书吏一人。最高长官为太监，从三品，负责检校书籍；少监协助太监一同检校书籍；监丞从五品，只负责协助太监参校儒籍；译史专门翻译儒书；监书博士择朝臣之博识者为之，负责品定书画。监下设有艺林库和广成局，艺林库掌贮藏书籍，设大使副史各一员、库子二人、本把二人。广成局掌传刻经籍及印选之事。元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都配备了大量的翻译人员，如经筵译文宫，扎鲁忽赤，蒙古书字，蒙古必阁赤，译史，通事等，据《元史·百官志》记载，“配备在中央机构省、部、院、府、台、司、寺、监等以及各族所属部门中的译员计有：蒙古必阁赤一百零八人，蒙古书字三十四人，译史二百零四人，通事一零七人，合计四五三人。”^[2]其中负责为帝王翻译和讲解儒家经典之类的职责由经筵译文官来完成。

元代官方翻译主要有蒙汉两种文字的互译、其它文字的翻译等两个方面。由于在元朝统治下的汉人占绝大多数，因此蒙汉两种文字的互译是经常的、大量的。其翻译内容主要包括诏书制诰及官方文书的翻译、儒家典籍之类的翻译、汉族大臣奏章的翻译、国史的编译等四种。成吉思汗时期，畏兀儿体蒙古字曾通用六十多年之久，忽必烈继位后，命八思巴制成蒙古新字，俗称国语，于1269年正式颁行。“忽必烈命八思巴制蒙古新字，则是适应元朝多民族国家建立后的需要，要求拼写蒙古语的新字，同时还能译写其他民族的语言，主要是汉族的语言。”^[3]“蒙古新字还用来翻译汉文的经、史等文献，供蒙古贵族子弟学习，加强了蒙汉藏等语言文化的交流。”^[3]

元代自世祖时期开始，中央政府先后用蒙文翻译了《五经》、《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周礼》、《春秋》、《孝经》等经典书籍。儒经中最重要的是《四书》，《四书》的纲领为《大学》，因此，“世祖为亲王时，邀赵壁教蒙古生徒十人学儒，并命他本人学蒙古语，翻译《大学衍义》，世祖经常在马上听他讲解此书。”^[4]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开始敕选儒士，译写经书。其后又置经筵译文宫，向皇帝讲解经史之类。至元五年（1268），敕从臣秃忽思等录《毛诗》、《孟子》、《论语》。大德十一年（1307）八月，中书左丞相孛罗铁木尔曾以蒙古字译《孝经》进，武宗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板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5]大德十一年（1307）仁宗为皇太子时，有进《大学衍义》者，命詹事王约等节而译之，帝曰：“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因命与《图像孝经》、《列女传》并刊行，赐臣下。”^[6]至大四年（1311），仁宗命以蒙古语译《贞观政要》刊行，帝览《贞观政要》，曰“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语以国语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诵习之”。^[7]仁宗延祐四年（1317）四月，“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迷失等译《大学衍义》以进，帝览之，谓群臣曰：‘《大学衍义》议论甚佳，其令翰林学士阿怜铁木儿译以国语’。”^[8]英宗至治元年（1321），“翰林学士忽都鲁迷失译进宋儒真德秀《大学衍义》，帝曰‘修身治国，无逾此书’。以《大学衍义》印本颁赐群臣”。^[9]泰定帝也孙铁木尔时，邓文原所讲的是《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等书，泰定元年（1324）正月命译《列圣制诏》及《大元通制》，刊本赐百官；二年（1325）七月纽泽、许师敬编类《帝训》成，请于经筵进讲，仍俾皇太子观览，有旨译其书以进；三年（1326）三月翰林承旨阿怜帖木尔等译帝训成，更名曰《皇图大训》，命授皇太子；七月诏翰林侍讲学士阿鲁威、直学士燕赤译《世祖圣训》，以备经筵进讲。文宗至顺三年（1332）四月，”命奎章阁学士院以蒙古字译《贞观政要》，刻板模印，以赐百官。”^[10]

元代皇朝典籍不仅在贵族阶级中得到了传播，而且在民间也得到了相当的普及。元代皇帝命译儒家典籍的同时，将译本赐百官、庶民以作行为准则。蒙古统治者通过对儒经的翻译，为儒学在元代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尤其为蒙古族学习汉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教科书，同时也为蒙古族作家的汉文创作奠定了基础。

二、版刻传播

元代儒经传播的另一渠道则为版刻。可分为官刻经籍、私刻经籍和坊刻经籍。早在太宗八年（1236）

“夏六月，……耶律楚材请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編集经史，召儒士梁陟充长官，以王万庆、赵著副之”。[11]书籍的版刻指使用雕版印刷手段传播书籍的方式，是一种公开的、正式的传播渠道，因此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较广的覆盖面。自宋代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起，雕版印刷到了元代已有了较快的发展，而且元仁宗皇庆年间王桢木活字和转轮排字架的发明更是推进了印刷业的进程。

元代刻书业极为发达，当时就有大都、平水、杭州、建阳等四大刻书中心。元代所刻儒家经典，包括官刻本、私刻本和坊刻本。官刻本分为内府刻本和地方官刻。内府刻书机构有国子监、秘书监的兴文署、艺文监的广成局、太史院的印历局及太医院的广述局，其中艺文监的广成局掌传刻经籍及印造之事，主要以刻印经籍译本为主，局内分别设有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直长一员，司吏一员。地方官刻包括地方衙署、路学、儒学、郡学、府学、书院。其中以学校、书院刻本最具影响力，其原因有二：第一，书院刻本一般都字体优美，技术精良；第二，书院刻印书籍的数量非常之大。如紫阳书院至元二十五年（1288）所刻《周易集义》六十四卷、《周易要义》十卷、雪窗书院所刻《尔雅注疏》十一卷、崇川书院所刻《春秋诸传会通》二十四卷、中溪书院所刻《周易本义附录集注》十一卷均属较好的刻本。

私刻是指私塾所刻之书。元代的私刻也不逊色于宋朝，据《书林清话》的记载，当时私刻就有四十多家，而且有不少质量很高的书，如岳氏荆溪家塾所刻《春秋经传集解》、平阳梁宅刻本《论语注疏》、平水曹氏进德斋刻本《尔雅郭注》等都很有名。

根据《元代版刻综录》，元代所刻之儒书有：《四书集注》、《四书集注通证》、《四书集成》、《四书集义精要》、《四书经疑问对》、《四书待问》、《四书疑节》、《四书通》、《四书标题》、《四书辑释》、《四书纂笺》、《四书章句纂释》等十二种；《六书正误》、《六书正伪》、《六书统》、《六书故》等七种；《论语》、《论语注疏》、《论语注疏解经》、《论语集注》、《论语集注考证》、《论颂》等六种；《诗经旁注》、《诗经疑问》等二十三种；《尚书注疏》、《尚书统考》、《尚书蔡传音释》、《尚书表注》、《尚书纂传》等五种；《易林》、《易疑》、《易学辩惑》、《周易略例》、《周易五赞》、《周易集说》、《周易集传》、《周易经义》、《周易经传集解》、《周易传》、《周易参义》、《周易参同契发挥》、《周易疑》、《周易象义》、《周易本义集成》、《周易本义附录集注》、《周易系词述》、《周易兼义》、附音义、《周易郑康成注》、《周易程朱先生传义附录》、《周易程朱传义音训》、易图、《周易经传集程朱解附录纂注》等二十八种；《春秋辩疑》、《春秋胡氏传》、《春秋传》等二十五种；《大学章句》、《大学衍义》、《大学或问》等三种；《小学集解》、《小学紺珠》等两种；《周礼》、《周礼补亡》、《周书王会补注》等三种；《礼记集说》、《礼记纂言》、《礼书》、《礼经会元》等四种；《孟子》、《孟子注疏解经》、《孟子集注》、《孟子内外篇》等四种。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著录，蒙元时期刻印、传播之图籍，经部为八百零四种。据《秘书监考书目》，凡在库书，经部百二十一部；先次送库书，经部六部一百一十三册；续发下书，经一百六十六部一千九百四十六册。

元代刻印儒学典籍数量之多由此可见。同时可以看出随着年代的推移，版刻卷数逐渐增多。由于元代所刻儒家典籍为数甚多，难能一一胪列，兹仅举私塾所刻儒家典籍为例，以窥见其一斑。

私塾名称	年代	所刻书名	卷数
熊禾武夷书室	至元二十六年	胡方平《易学启蒙释》	二卷
平阳府梁宅	元贞二年	《论语注疏》	二十卷
平水曹氏进德斋	大德三年	《尔雅郭注》	
刘君佐翠岩精舍	延有元年	《周易传义》	十卷
精一书舍	延有四年	《孔子家语》	三卷
溪山道人田紫芝英淑	至治年间	改元刻《四书疑节》	十二卷

刘君佐翠岩精舍	泰定四年	胡一贵《朱子诗集传附录篆蔬》	二十卷
建安郑明德宅	天历二年	《礼记集说》	
陈忠甫宅	天历庚午三年	《楚辞朱子集注》	八卷
存存斋		《周易集说》	十卷
崇川书府	至正十一年	本廉《春秋诸传会通》	二十四卷
虞氏南溪精舍明复斋	至正十一年	《春秋诸传会通》	二十四卷
刘君佐翠岩精舍	至正十四年	董鼎《尚书辑录篆注》	六卷
		赵仿《春秋属辞》	十八卷
商山书舍	至正二十四年	《春秋左传补注》	十卷
		《春秋师说》	三卷

从列表可推断出两点：

(一)元代所刻儒家典籍内容以对经典的训解和注释为主。

(二)在数量上《四书》为数最多。“自朱文公行世，学者童而习之。或病其不能骤通也，为《语孟句解》，取《集注》语裂而附之，刊本如麻，数十年比比然，其体弗类”。^[12]“海内蓄朱子之书，人习圣贤之学。”^[13]“穷徼绝域，中州万里之内外，悉家有其书。”^[14]可见，朱熹《四书集注》是充塞市场的。

(三)随着年代的推移，所刻儒家典籍卷数增多。说明元人对儒经的热衷程度逐渐加深了。

经籍的大量刊刻为喜好经籍的读者提供了方便。当然能够有余资购买书籍的，主要还是以皇家贵族，达官贵人，文人士子为主。而元代的皇家贵族，达官贵人多数是蒙古族，因此可以推断，经籍购买者的大多数是蒙古族，所以经籍的大量刊刻、广泛传播为蒙古族的文人士子接触儒经提供了方便，从而，也为蒙古族作家操用汉文进行创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教育传播

(一) 科举考试

元代科举制度的实施是理学被定为官学的标志，因此论元代科举，不得不说理学。自汉代以来，儒学在经学的基础上还吸收了儒家经典以外的、异己的观念来诠释儒家思想，到了元代形成了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即所谓的“性礼之学”。理学始于宋，由哲学和伦理纲常两大部分组成，也称“程朱之学”。陈垣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称理学为新儒学，他说：“他们讲的是万物一体之道，故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他们的工夫则从‘存天理，去人欲’入手。他们的规模与节目，则为古代大学篇中所举的‘格物、致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项。他们大率都象范仲淹那样，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他们都抱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15]以此看来，理学被元朝定为官学是不无道理的。

追溯科举制度的历史，要到隋朝时期。魏晋南北朝实行以门第出身为标准的“九品中正”选官制度，到了唐朝，中央集权为了扩大统治的阶级基础创立了科举制度。有元一代，由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巨大差异，盛行六百多年的科举制度被中断了半个世纪之久，直到仁宗皇庆二年(1313)，再行科举。“元朝共举行科举16次。从皇庆二年到元统三年(1335)有7次，从至元六年(1340)恢复科举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举行了9次。”^[16]由于理学的逐渐官方化，文教政策体现出尊经崇儒，表彰理学的特色。而考试程序和内容的伦理教化成为其主要表现。

1238年，太宗听从耶律楚材的建议诏行“戊戌选法”，内容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

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元代仁宗皇庆二年(1313)，诏行科举，规定科举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乡试、会试、御试三道。诏书写到：“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先，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举人从本贯官司于诸色户内推举，年及二十五岁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节状保举。”[17]可见，选取举人是以儒家德行为标准的，诏书还严格规定了考试程序和内容：“汉人、南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实时物内出题，不矜浮躁，唯物直述，限一千字以上。”[18]显然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以对儒经的训诂和阐释为标准的。

元朝实行“岁贡儒人”制度，“实历二周岁以上，许充试，汉人私试，孟月试经疑一道，仲月试经义一道，季月试策问、表章、昭告科一道。蒙古色目人，孟、仲月各试明经一道，季月试策问一道。”[19]可见元代的文教政策，从内容到方式都体现出尊经崇儒，表彰理学的特点。不过“科举实行后，在政治上多少满足汉人地主要求广开仕途的愿望，也使汉文化在蒙古、色目人中进一步传播。”[20]元代科举在尊经崇儒的同时也为儒学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二）学校教育

元代文治得以兴盛，人才得以辈出，其原因之一就是学校的繁荣。可以说，元代学校是科举的后备力量。元代的文教政策体现出一种尊经崇儒，表彰理学，为皇权服务的特色，然而一切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因此，元代学校的兴盛在表彰理学的同时也为传统文化得以发展，儒经得以传播创造了条件。元代自始建国子学以来先后设立了回回国子学、蒙古字学、路学、府学、州学、县学、医学、书院、乡学、义学、书塾等学校，大致可分为中央官学、地方官学、私学。各级学校的教学都呈现一种伦理教化色彩。中央官学，地方官学，私学的教学内容不仅以儒家十三经为主，而且以程朱理学思想阐释儒家经典。

元朝选择学宫的标准比较严格。就师道问题，虞集认为教师是学校之根本，治学首先当治其源，他说：“师道立则善人多。学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于成德达材者也。……为之今计，莫若使守令求经明行修成德者师身尊之，至诚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观感也。其次则求夫操方正而不诡异骇俗者，确守先儒经义师说而不敢妄为奇论者，众所敬服而非乡愿之徒者，廷致之日，讽诵其书，使学者习之，入耳着心，以正其本，则他日亦当有所废也。其次则取乡贡至京师罢归者，其议论文艺犹足以耸动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21]至于学官的来源问题，全部由朝廷选拔委任。太宗六年(1234)，以冯志常为国子学总教，设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到了泰定三年(1326)，更积分而为贡举，其学官以举积分生员充之：积分既格、于上齐举年三十以上、学行堪范后学者充其学正、学录；通晓音律、学业优瞻者充司乐；干局通敏者充典籍、管勾；于上、中齐，举礼仪习熟、音吐洪畅、曾掌春秋译奠、每月告朔明赞、众与其能者充侍仪舍人。

元朝地方官学包括路学、府学、州学、县学、医学、书院社学，这些学校的师资由中央官府来配备。路学、府学、上中州学的教师由教授来充任，其来源为师儒之命于朝廷者。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凡路府州县及书院置之。直学考满，又试所业十篇，升为学录、教谕，后改直学考满为州吏，备榜举人充学录、教谕，学录、教谕历两考，升学正、山长。后改为以下第举人充学正、山长，学正、山长历一考升散府上中州教授。教授之上，各省设提举，凡学校之事。学录、教谕或由集贤院及台宪等官充之。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书院的山长，书院教育在元朝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山长的资历代表了元代地方官学的资历。山长的来历主要有四种，即大儒名宿、圣贤子孙、晋升的学官及下第举人等。大儒名宿包括由书院创办者礼聘的名儒和元朝政府所举宋之隐逸，因此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相应的学术知名度是肯定的；圣贤子孙是一些继承书香门第的人，这些人也有一定的学术水平；下第举人的儒学水平自然不必多说。总体来说，是否具有相当水平的儒学知识是元朝配置学官的前提。

教科书也是儒学传播的主要渠道。元朝的各级学校大多不仅选择儒家经典作为教科书，而且刻意以程朱理学思想阐释儒家经典。首先国子学的教科书体现了这一点。京师国子学以译写《通鉴节要》教诸生。至元二十四年(1287)所设立的国子学，设博士讲授经旨，还规定“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22]“世祖皇帝至元二十四年(1287)，置国子监学，以孔子之道教近侍国人子弟、士之子、俊秀之士。其书《易》、《诗》、《春秋》、《礼记》、《孟子》、《大学》、《中庸》，其说则周、程、朱、张氏之传也。”^[23]至元二十六年(1289)置回回国子学、回回国子监，成宗大德八年(1304)始定国子生试贡法，仁宗延祐二年(1315)定国子学试贡之法之升齐，中两齐讲说《四书》，上两齐讲说《易》、《书》、《诗》、《春秋》科。

中央官学如此，地方官学和私学也不例外，诸路蒙古字学以译写《通鉴节要》颁行各路，俾肆习之，当时已用先进的技术刊印文教书籍和教科书，而所印书籍大多为程朱理学的教科书，元朝后期私人办学的主要教材也大多是程朱理学的一套。

参考文献

- [1] (清)顾嗣立. 日知录[M]. 卷十八.
- [2] 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1984. 126.
- [3] 蔡美彪. 中国通史[M]. 第七册, 第 91-92 页.
- [4] (明)宋濂等. 元史[M]. 卷一百五十九, 列传第四十六, 赵壁传,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第 3747 页.
- [5] (明)宋濂等. 元史[M]. 卷二十二, 本纪第二十二, 武宗本纪第 486 页.
- [6] (明)宋濂等. 元史[M]. 卷二十四, 本纪第二十四, 仁宗本纪第 536 页.
- [7] (明)宋濂等. 元史[M]. 卷二十四, 本纪第二十四, 仁宗本纪第 544 页.
- [8] (明)宋濂等. 元史[M]. 卷二十六, 本纪第二十六, 仁宗本纪, 第 578 页.
- [9] (明)宋濂等. 元史[M]. 卷二十七, 本纪第二十七, 英宗本纪第 608-609 页.
- [10] (明)宋濂等. 元史[M]. 卷三十六, 本纪第三十六, 文宗本纪第 801 页.
- [11] (明)宋濂等. 元史[M]. 卷二, 本纪第二, 太宗本纪第 34 页.
- [12] (元)陈栎. 定宇集[M]. 卷十七.
- [13] (元)苏天爵. 滋溪文稿[M]. 卷三零, 《题晦庵先生行状后》.
- [14] (元)袁桷. 清容居士集[M]. 卷一八, 《庆元路部县学记》.
- [15] 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M]. 第九章, 上海: 商务印书馆出版, 1994. 188.
- [16] 李子广. 科举与古代文学[M].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99. 255.
- [17] (明)宋濂. 元史[M]. 卷八十一, 志第三十一, 《选举一-科目》第 2018 页.
- [18] (明)宋濂. 元史[M]. 卷八十一, 志第三十一, 《选举一-科目》第 2019 页.
- [19] (明)宋濂. 元史[M]. 卷八十一, 志第二十一, 《选举一-学校》第 2030 页.
- [20] 蔡美彪. 中国通史[M]. 第七册, 第 227 页.
- [21] (明)陈邦瞻. 元史纪事本末[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 1979. 59.

[22] (明)宋濂.元史[M].卷八十一,志第二十一,《选举一-学校》第202页.

[23]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M].卷六,《国子监题名序》.

The Way of Spreading the Confucianism in The Yuan Dynasty

NA-Ri ya

(Department of Chinese, Inner Mongolian Normal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 Hohhot, 010022)

Abstract: In The Yuan Dynasty, The Confucianism had been permeated into every group of our society by promoting education system. Accordingly, it had been the most necessary tool to perfect the policy system and education system. There are three main ways spreading the Confucianism in Yuan Dynasty. They are as follows: books、Imperial examinations、Schools. It mainly embodied the translation of books, the process and content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the choice and expound of the textbook.

Key words: Yuan Dynasty ;Confucianism;Spread

收稿日期: 2007-10-6;

作者简介: 娜日雅(1975—),蒙古族,女,内蒙古集宁人。内蒙古师范大学青年政治学院教师,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蒙古族古代文学研究。